

中共國家能力分析：從黨組織觀點論述

初國華

菲律賓比立勤大學在台分部

摘 要

蘇聯瓦解並引起東歐共產政權骨牌效應，中國遂廣受世界性輿論與學界預測是下一個骨牌。但似乎是「中國崛起論」代替「中國崩潰論」。西方學界預測中國趨勢往往得到垮台或動亂結論。這推論常忽略「中共因素」的反應、抵制與適應能力，以及中共回應外界挑戰的作為。因此，中共的國家能力可能是引起外界「測不準」的原因。本文以 Skocpol 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這兩個概念為分析架構結合中共黨組織運作（黨的建設、調適與轉型），來觀察中共的「國家能力」取得與運用。

關鍵字：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中國共產黨、中國崩潰論

Analysis of State Capacity in Chinese Communism Party

Gwo-Hwa Chu

Taiwan Branch
Bulacan State University, Philippines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in company with East-Europe regimes into the domino effect, then the worldwide nations and scholars predicted China the next domino broadly. In fact, it seemed to the thesis of China rising instead of China collapsing. Generally, western scholars predicted Chinese trend as collapse and turmoil. This reasoning usually neglected China-factor its reaction, resistance and adapt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exer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Party(CCP) against external challenges. Thence, the CCP-capacity may be the causation resulting in the predictive failure. This article unfolds its key idea and analytic framework with Skocpol's concept the state autonomy and state capacity. This bi-conceptual analysis framework combines CCP's exercise for party-organization in party's building,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observe how the capacity is achieved and power is exercised by CCP.

Key word : state autonomy、state capacity、Chinese Communism Party、China collapsed

一、前言

九〇年代，蘇聯瓦解並引起東歐共產政權的骨牌（domino）性土崩效應，作為唯一共產主義大國的中國大陸，遂廣受世界輿論與學界預測，中國是下一個骨牌。尤其，從台灣早期的「反共必勝、暴政必亡」到李登輝時期的「七塊論」與國際間的「中國崩潰論」¹。西方學術界的預測與探討²中國改革的「政左經右」將使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紊亂，從而帶來社會的相對剝削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中產階級崛起、國營企業虧損、銀行壞帳、大量失業潮與官員尋租（seek-rent）等等負面作用，進而導致政權動亂與不穩。但事實卻是「中國崛起論」代替「中國崩潰論」。如今，中國並進一步強調「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發展。是以，如何解釋與調適「中國崩潰論」與現實中國之間的落差（gap）是本文的研究動機，也是台灣從「三不政策」氛圍下「妖魔化中國」論述，走向廿一世紀新觀點的省思。基本上，西方學界往往從共產主義集團的結構一致性與大陸的部份事實作推論與延申、或從政治經濟學邏輯解釋與預測中國大陸的趨勢與走向，而得到垮台或動亂的結論。另一方面，就美國主治價值下的「民主和平論」而言，「中國崩潰論」是可欲（desirable）的邏輯推論與歸宿。然而，共產國家集團的國際結構分析與「政治保守，經濟改革」的悖離式語義崩潰預測，就主觀上的意識型態偏好或客觀的事實動態發展而言，其推論過程都忽略「中共因素」的反應（reaction）、抵制（resist）適應（adaptation），以及中共回應（response）外界變遷與挑戰的能力（capacity）。基本上，有關中共改革政策與體制轉型的

¹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其次，2002 年中國官方學者樊綱指出，海外流行「中國崩潰論」。請閱 樑京，「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會崩潰之爭的感想」，*大紀元文化網*，2002 年 9 月 24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2/9/25/c9002.htm>；另外，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楊文昌，在中國的《求是》雜誌表示，九十年代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無法維持將會崩潰，因此被稱為「中國崩潰論」。請閱「中國威脅論真改變了？專家持不同看法」，*大紀元*，2007 年 6 月 26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6/26/n1755006.htm>；最近中共總理溫家寶說，不管是「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歸根結底都是對中國缺乏正確認識。請閱「溫家寶面對中英公眾代表吐肺腑之言」，中新社（北京），2008 年 01 月 18 日，<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ctv.com/china/20080118/106972.shtml>

² Goldman, Merle.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ing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Rowen, Henry S. "With Growth, China Could Get Democracy So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1, 1996.; White, Stephe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vol.38, no.3 (April 1986).

研究文獻甚夥³。本文從「中共因素」的角度切入，觀察中國大陸「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之取得與運用。

中國大陸是施行「黨國一體」的共產（Communism）政權。黨即國家甚至凌駕國家。因此，本文以 Theda Skocpol 的「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⁴等概念與分析架構，觀察中共如何面對與反應政治環境變遷與外在挑戰（challenges）而使政權存續。亦即，從自主性與能力角度觀察中共如何成功的回應政治環境變遷與風險挑戰，其「反應」、「抵制」與「適應」的措施與過程又如何？基本上，國家自主性是國家能力的前提要件與背景，且兩者有辯證關係（dialectical）。亦即國家自主性為國家能力的取得提供利基（foundation），而後者的增進又強化前者的確立，使兩者有彼此強化與加乘效果（synergy）。基本上，共產主義是動亂社會與革命混亂的早期產物。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後歷經：清黨、內部權鬥⁵、五次圍剿、抗戰、國共內戰、朝鮮戰爭、大躍進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後毛澤東時代如：四人幫事件、天安門事件都可謂是內外政治環境對中共的重大挑戰。另一方面，雖然中共政權受到國際間與台灣的負面評價與攻訐，但本文基於價值中立（value-free）立場，擬探討「中共倖存」（survival）以及隱藏在其背後的能力基礎。事實上，台灣早期的「反共必勝，暴政必亡」到近年的「中國七塊論」與「崩潰論」，可能都涉及上述「理論預測與事實存在的落差」。因此，台灣如何正確與理性看待（perception）與評估（assess）中國，可能都是永遠的課題。

³ 楊小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教訓」，收錄於 陳一諮等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台北：桂冠，1991 年）；陳一諮，「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革及其成敗」，收錄於 陳一諮等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吳玉山，「大陸經改與兩岸關係」，收錄於 張煥卿、段家鋒、周玉山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三民，1991 年）；薩公強，**中共十年經改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1 年）。

⁴ Theda Skocpol, Evans Peter B.,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⁵ 毛澤東曾概況黨內的權鬥為「十次路線鬥爭」。中共文獻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這十次路線鬥爭計有：（1）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2）李立三左傾冒險機會主義，（3）瞿秋白左傾冒險機會主義，（4）羅章龍分裂主義，（5）張國燾分裂主義，（6）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7）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8）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9）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10）林彪反革命集團。請閱 中共術語彙解編輯委員會，**增訂中共術語彙解**（台北：中國出版公司，1977 年），頁 66。

二、中共的自主性

就 Skocpol 學理而言，中共黨組織的自主性探討應即類比於「國家自主性」探討。此因西方「國家論」(state theory)的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 school)復興奠基於西方多元民主社會的客觀基礎與人文屬性。故國家自主性研究是國家如何能在多元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與壓力團體(press group)影響下，仍能堅持國家政策的專業性與公正性。但在中國的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則應轉變成，人民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國家與領導國家過程中，如何形成自身的自主性(autonomy)？葛蘭西(Gramsci)認為，政黨的目的是要創造政治意志⁶。因此，中共黨組織在建構全民政治意志過程，同時也樹立自身的國家自主性。不同於西方國家獲取自主性是對抗、協調與管理眾多的「利益團體」。中共的自主性獲取主要是如何形成自身行動的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ous)與自主意識(autonomy consciousness)以提升自身的能力或「國家能力」，來獲得自身的偏好(preference)政策或目標，亦即國家自主性的取得。就中共觀點，國家自主性應是國家能力的基礎，前者對後者有密切關係與重要性。基本上，中共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立基於：黨的建設、調適與轉型。本節探討國家自主性與黨的建設。

中共黨組織是列寧(Lenin)建黨思想的產物。以政黨光譜(spectrum)而言，列寧主義政黨應屬於極權式(totalitarianism)群眾黨。列寧式政黨以馬克思主義(Marxism)為號召並重視群眾基礎。它是類似軍隊的強力組織，權力集中、紀律嚴整、行動一致為特徵。這個由職業革命家(列寧語)為主導的黨，由「菁英所組成，它獨立於群眾之外，卻又和群眾保持接觸。黨提供意志和指導，是無產階級(proletariat)的先鋒」⁷。歸納列寧對於革命的建黨理念有：(1)集中制：權力集中於中央，工作分散於地方。地方組織是為鞏固中央領導。黨中央有兩個領導中心，一個中央機關負責思想領導，一個是「中央委員會」負責直接的實際領導工作⁸。(2)先鋒隊特性：列寧分析俄國實際情況發現，革命無法依群眾的自發性行為，必須用職業革命家的作用。先鋒隊的特性就是要求職業革命家黨作為實踐革命、領導群眾的先行者，擔任起前鋒的角色。(3)黨對群眾立場：主

⁶ 張弘遠，「由結構功能面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設計與變遷」，**東亞季刊**，第28卷第4期（民國86年秋季號），頁72。

⁷ 同上註，頁83。

⁸ 傅岳邦，「新世紀中國共產黨體質轉型之展望」，**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12期（民國90年12月），頁41。

張「由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黨的焦點應放在群眾身上，透過對群眾力量的體現與掌握以獲得群眾支持。（4）知識份子的領導與中介角色：不管是對革命理念的宣揚、對理論與現實的聯繫或在實際鬥爭，都仰賴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⁹。中共官方指出，黨組織要作到：（1）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2）群眾路線是黨工作的根本路線；（3）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4）實現、發展和維護人民利益是黨的任務和責任；（5）從嚴治黨，懲治腐敗，抓好黨風廉政建設¹⁰。

中國共產黨最明顯的特徵是階層式（hierarchical）、金字塔式（pyramidal）與高度的權力集中。中共組織的金字塔結構的層級（level）分：（1）中央委員會組織¹¹；（2）省級黨組織¹²；（3）鄉鎮級黨組織；（4）基層黨組織¹³分佈於學校、工廠和社區。依列寧政黨（Leninist party）屬性傳統，中國共產黨賦予全國代表大會（全代會）¹⁴最高權力，至少在名義上是如此。「全代會」由所有黨員選舉黨代表而產生，黨員代表則在省級及更基層的黨組織選舉產生¹⁵，以反映

⁹ 張弘遠，「由結構功能面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設計與變遷」，頁 81。

¹⁰ 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三個代表學習讀本**（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 年），頁 215~236。

¹¹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 5 年。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有 5 年以上的黨齡，其名額由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中央委員會委員出缺，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按得票數依次遞補。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請閱 中共術語彙解編輯委員會，**增訂中共術語彙解**（台北：中國出版公司，1977 年），頁 18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網**（北京），2002 年 9 月 4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4602.htm>

¹² 省級黨組織是各地區黨組織的重要單位與核心，它被稱為「戰鬥堡壘」以保證黨的政策與路線貫徹。所有基層的黨組織都被各級的黨書記所領導，而各書記又由某一中央委員所領導。see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Hilo: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2), p.92.

¹³ 中共基層黨組織是指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等基層單位的組織。請閱「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加強民主黨派工作方面的任務是什麼？」，中共中央統戰部，2006 年 5 月 26 日，<http://www.zyztb.org.cn/zytzbwz/ztlm/5ddhz/xxwd/80200506140034.htm>

¹⁴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機關。每 5 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級組織提出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前舉行；如無非常情況，不得延期舉行。其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修改黨章；選舉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請閱 中共術語彙解編輯委員會，**增訂中共術語彙解**（台北：中國出版公司，1977 年），頁 184；「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人民網（北京），<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58/index.html>

¹⁵ 中共各級代表大會和它們所產生的委員會是地方各級的領導機關；各級委員會向同級的代表大會負責。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採無記名投票方式。各地方各級委員會如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和自

權力的分佈情形。它被當作匯集黨員甚至人民意見的功能，它創造一種意義與氣氛，使來自中國各地的基層黨員也能參與黨的重要決定。這使黨員產生承諾意義（sense of commitment）而團結與效忠於黨及黨的領導人¹⁶。中共黨組織原則稱為「民主集中制」，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全黨各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黨的下級組織須執行上級組織的決定。下級組織如認為上級組織的決定不符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實況，可請求改變決定。如上級組織堅持原決定，下級組織必須執行並不得公開發表不同意見，但有權向再上一級的組織報告¹⁷。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指出，重視黨的建設是中共黨組織的傳統。毛澤東把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合稱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中共在改革開放後，依然稱黨的建設是重要法寶。黨的建設主要包括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還可加上黨的政治建設、幹部隊伍建設等等。加強黨的建設是為更好的領導全黨和全國。¹⁸李君如指出，自「十六大」以來，中共黨中央提出黨建設總體布局，這有兩個結論：一是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和制度建設，以加強黨執政能力為重點，而以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¹⁹為主線；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其關鍵在黨。總之，黨建設總體布局在增強黨的抵禦風險和拒腐防變能力²⁰。基本上，中共黨組織源自俄共，且兩者都是革命潮流與政治環境劇變下的時代產物。不論俄共或中共政權

治州的委員會，每屆任期 5 年。其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有 5 年以上的黨齡。縣（旗）、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委員會，每屆任期 5 年。其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有 3 年以上的黨齡。請閱「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人民網（北京），<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58/index.html>

¹⁶ Franklin Hou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1967), p.74.

¹⁷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人民網（北京），<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58/index.html>

¹⁸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中共黨建布局獲 11 大新進展」，金羊網（廣州），http://big5.ycwb.com/news/2007-07/10/content_1544232.htm，2007 年 7 月 10 日。

¹⁹ 「十六屆四中全會」，「胡溫體制」提出「加強執政能力」並以「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作為思想教育的內容。預計從 2005 年元月開始推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為「胡溫體制」鞏固政權的重要措施，其明顯脈絡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五個統籌」為施政綱領，「加強執政能力」為手段，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則是「加強執政能力」的基礎，這不只是思想教育運動更是黨組織的整頓。請參閱 王信賢，「中共保先運動的發展與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2 期（民國 94 年 2 月），頁 15。

²⁰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中共黨建布局獲 11 大新進展」，金羊網（廣州），http://big5.ycwb.com/news/2007-07/10/content_1544232.htm，2007 年 7 月 10 日。

的建立，都可視作自身黨組織對政治環境挑戰的反應是成功的，也是黨自身「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有效建立與運作。若延伸此觀點，則「蘇東波」後的東歐政權垮台是渠等國家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埋沒於政治環境變遷的波濤洪流之中。就此而言，則更突出中共政權的自主性與治理能力（governance）特徵。基本上，中共是透過黨的建設與完善來取得自主性與治理能力，以面對及反應內外政治環境的挑戰與變遷。

三、中共的國家能力

中共在「國家自主性」建設過程與結果中，奠定與累積「國家能力」的來源與基礎。本節從三個面向（意識型態、黨的人力與運用、控制政府與國家）分析中共的「國家能力」：

（一）意識型態（ideology）是中共「國家能力」的泉源。中共以馬克斯主義（Marxism）為根本性的意識型態²¹。基本上，馬克斯（Marx）認為意識型態是統治階級尋求使現行秩序與其本身特權地位作合理化結合的觀念²²。基本上，意識型態提供一組對自身、社會與他人的共同觀點，因而有助於群眾的結合。這使意識型態產生無形的拉引力量，推動組織成員前進與團結。通常意識型態被設想為具有團結政治組織成員以達成政治行動之目的。因此，意識型態與政治運動交織成一體²³。任何意識型態其特性至少有：（1）以群眾為取向（mass-oriented），意識型態要求直接向社會大眾開放以便動員群眾；（2）以實踐為取向（praxis-oriented），意識型態不僅企圖對群眾起理念性啟蒙，且希望動員群眾掀起廣泛的社會集體實踐²⁴。事實上，任何政權都會從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出發，將意識型態視為追求「國家利益」與「國家目標」的手段，此種利益與目

²¹ 中共認為，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產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歷史性飛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則是改革開放以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大理論成果。請參閱「中共黨組織引進民企理論的創新道路」，**星島環球網**（香港），http://www.singtaonet.com/82/china/200708/t20070809_594510.html，2007年10月2日。

²² 意識型態是一個信仰體系，它為既存或構想中的社會提供解釋與世界觀（view of world）並辯護其所偏好的政治秩序，且為自身的實踐提供策略、過程、制度與計劃。因此，意識形態宛如無形的圖騰，它供給人們認知也驅動人民與群眾。請參閱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匪黨鬥爭策略研究**（台北：黎明文化，民國68年），頁4。

²³ 同前書，頁14。

²⁴ 李英明，「論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收錄於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資料中心編印，**中國大陸研究教學參考資料**，第52期（民國76年11、12月），頁77~78。

標通常有：政治穩定、政治整合與經濟發展²⁵。

中共的意識型態是當代最大的組織性意識型態。馬列主義（Marx-Lenin Communism）對中共的形成與發展有重大影響與作用。亦即，馬列主義曾是中共建黨和發展組織的重要工具²⁶。長久以來，共產主義鮮明而獨特的意識型態一直是共產黨創始、革命、奪取政權乃至治國、執政的重要基礎。一方面，它是統治階級權力行使的合理化根據，可將強制性的權力行使轉化為合理而正當的權威效用，使民眾或黨員心悅誠服的認同中共與遵從黨的領導，也是中共領導階層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意識型態經由「政治社會化」過程，內化（internalized）成政治成員的政治人格（political character），形成對政權認同的共識價值，是政治體系整合的黏接劑，這體現於共黨對政權的全面控制²⁷。中共期望意識型態能實現五種功能：（1）成為社會大眾和黨員幹部唯一的生活語言或參考架構。亦即，希望為他們提供唯一認識周遭環境和政治體系的「世界觀」或參考架構（reference framework）；（2）成為人民社會生活和政治運作的溝通背景，並為他們提供未來的願景目標與發展方向；（3）成為當權者或統治的「合法性」或「正當性」基礎；（4）成為促成黨內團結一致的工具；（5）成為徵召新的接班人或領導人的手段²⁸。然而，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將馬列主義當作神化個人的工具，毛澤東企圖將個人的言論思想取代馬列主義的歷史權威。因此，中共的意識型態曾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政治神話工具²⁹。雖然，中國在「三信危機」後，面臨意識型態的減損與「國家能力性」的退卻，然而中共透過黨國體質轉型與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建設有成之下，安然渡過「文革」或「六四事件」的政治危機與衝突，而逐漸走上區域強權或世界強權之路。

（二）黨的人力與運用。列寧曾說：給我們一個革命者的組織，否則我們將無由倒轉整個俄羅斯。列寧甚至說：無產階級沒有什麼武器可奪取政權，唯一有的就是組織武器³⁰。中共「國家能力」實質上是由黨員或組織武器所匯集起來的加乘效果。中共的專政能力能單獨（solo）決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目標，然而要

²⁵ 同上註，頁 90

²⁶ 李英明，「論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頁 80。

²⁷ 傅岳邦，「新世紀中國共產黨體質轉型之展望」，頁 36。

²⁸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臺北：永然，民國 80 年），頁 223。但李英明教授指出，以上這五個功能在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大陸，只有（4）、（5）項是中共能勉強作到的。因為後文革的人民甚至黨員基本上已不再以中共的官定意識型態作為生活的參考架構與溝通憑藉，也質疑意識型態作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請參閱 李英明，「論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頁 83。

²⁹ 李英明，「論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頁 81。

³⁰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匪黨鬥爭策略研究**，頁 42。

達到這些目的，主要透過篩選與甄補黨員而完成³¹。黨員是社會人口結構的「先鋒」與菁英（elite）。理論上，共產主義源於歐洲的工人運動或無產階級革命。因此早期中共也以工人運動為革命的原因、動力與目的。其黨的目標訴求或人力支援也以工人為基礎。另方面，農民運動是毛澤東自始即很重視的運動。在二〇年代革命早期，毛澤東調查分析當時的人口分佈即說，當時的中國人口分佈是「兩頭尖尖，中間粗」的人口結構。農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農民是革命的廣大腹地³²。中共操縱農民是透過農會，再通過黨員當農會領導人來完成。其次，青年運動也是中共重視的，尤其學生運動。中共青年運動的方式，是以共產黨領導青年團，以青年團領導學生運動，以學生運動帶動工、農群眾和婦女兒童及其他一般群眾。中共的群眾運動無所不包，縱使兒童也編有「兒童團」隸屬共青團掌握³³。早期中共從事游擊活動時期，主要幹部來自社會底層，黨幹部連繫中國共產黨與一般群眾，此即毛澤東所謂的「從群眾中來，也從群眾中去」。大部份基層幹部是農民，主要管理當時的農村事務。此外，當時黨組織的游擊隊運作型態須黨員獻身給黨並嚴格遵守黨紀與「民主集中制」³⁴。1949年，中共建政後所須的幹部是要管理國家的社會與經濟事務，這種人才需管理技巧與經驗，已不是來自農村或游擊隊背景可滿足條件，這時黨員的身份背景與忠誠度不再是政府幹部的必要條件。代之而起的是教育、技術技能與經驗成為黨幹部階層的首要條件³⁵。

中共適應外界挑戰也反應在黨員的結構與甄選上。中共的黨員結構有幾個特徵：1920年到1927年時期，從黨的「一大」到「五大」，黨員主要是城市知識份子、內陸省份礦工以及沿海的無產階級。但1928年「六大」時，大部份黨員已是地下工作的民族主義者。其次，從「六大」到「七大」，中共黨員甄補從知識份子轉向農民，農民是中共游擊隊的主要份子。從1939年開始，中共已在毛澤東掌控下，「七大」時有黨員120幾萬，此時中共進行黨員軍事化，「軍事共產主義」運作的環境與背景是對日抗戰。這時黨員主要來自「八路軍」和「新四軍」，當時黨員甄補要求的特性是戰鬥精神與紀律的嚴格要求，這形成黨員的最

³¹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Hilo: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2), p. 73.

³² 楊汝舟，*中共群眾路線研究*（台北：黎明文化，1976年），頁100。

³³ 同上註，頁117。

³⁴ 在這裡民主集中制，應指組織領導人由下級所產生，產生之後對下級做絕對的領導。請參閱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匪黨鬥爭策略研究*，頁42。

³⁵ Franklin Hou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 74.

大特色。之後，中共征服中國而其黨員則大部份都由戰士所組成³⁶。從 1956 年「八大」到 1961 年，黨員甄補的制度化保證黨員既有意識型態的「紅」又有專業技術的「專」。1954 到 1957 年的黨員擴充，要求黨員指導與管理國家的政經活動。由於新黨員甄選特性的專業需求，使「甄選型態」轉向黨員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文革」後，中共「甄選型態」的改善與努力也指向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在 1969 到 1973 年間，有 800 萬新黨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基本上，這時期中共的「甄選型態」比較注重：（1）城市地區工人；（2）女性；（3）少數民族；（4）年輕人。自 1978 年後，中共的「甄選型態」已增加知識份子，特別是專業知識的科學家。這些人在過去甚至被中共所隔離與排擠。如今，中共因甄補需要轉移而改變作風。到 1980 年代，中共的黨員「甄選型態」則要求專業化與能力，以使中國大陸走向現代化³⁷。至於黨員的階級基礎，「八大」黨章規定，只要是中國公民都適格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但「文革」後的「九大」與「十大」，改採只有「工人、貧農與中低農」才能成為中共黨員。從 1973 到 1982 年，中共的「甄選型態」要求黨員要符合四個要件：（1）由兩位黨員推薦；（2）從黨的內外部對黨員申請進行審查；（3）能被黨的基層小組所接受；（4）能被黨小組上一級的黨組織所接受。比較上，就入黨的推薦性而言，在四〇年代只有受到黨高層領導人的推薦才能成為黨員³⁸。基本上，文革後，中共鑒於「四人幫」的破壞性，因此加強「階級純化」與「黨紀律要求」，並寫進 1977 年與 1982 年的黨章，之後在黨員甄選與提拔黨的領導人過程，也都提升這兩個因素的重要性³⁹。

事實上，中共也將黨員管理視為國家能力建設的重要部份。中共的黨員管理其內涵主要包括：（1）黨員發展：遵照中共黨章規定把符合黨員條件的「各界優秀人物」吸收到中共的黨組織；（2）黨員組織管理：管理黨員的組織生活（統稱「三會一課」包括支部黨員大會、支部委員會、黨小組會、黨課）、民主評議黨員、黨員完成年度目標責任制、黨員連繫戶與責任區、評選優秀黨員、處置不合格黨員等工作；（3）黨員教育：按規定對黨員實施以馬克思理論、黨基本路線、黨基本知識為核心的「三基本」教育，同時輔以其它知識教育，並配合各級、各種形式「黨校」為主的教育；（4）其他工作：包括黨籍管理、黨員統計與黨費管理等。中共的黨員管理實行「一級指導一級」的垂直管理體系，即中央級、

³⁶ Ibid.,p.106.

³⁷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p.98.

³⁸ John M.Lindbeck,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Donald Treadgold ed.,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p.76.

³⁹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p.98.

省級、地方級、縣區級、基層黨部等。同時，中共宣傳系統、紀律檢查系統、中共人大、政協、政府、群眾組織、社會團體也承擔部份的黨員教育與管理工作，但要接受同級黨委的指導與協調⁴⁰。基本上，中共黨員管理工作是中共維持黨內領導人獨裁與維護全黨一致性，進而對大陸社會實行「一黨專政」的重要手段。所以，控制黨員的思想與行動，是中共各級黨組織的出發點和目的所在⁴¹。

截至 2006 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 7239 萬名（圖 1）。中共中央組織部指出，

圖 1 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統計表

黨代表大會	年 份	黨員人數
一大	1921	57
二大	1922	123
三大	1923	432
四大	1925	950
五大	1927	57,967
六大	1928	40,000（註）
七大	1945	1,211,128
八大	1956	10,734,384
九大	1969	20,000,000
十大	1973	28,000,000
十一大	1977	35,000,000
十二大	1982	39,650,000
十三大	1987	46,000,000
十四大	1992	51,000,000
十五大	1997	59,000,000
十六大	2002	66,940,000
十七大	2007	73,360,000

資料來源：(1)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An Introduction*(Hilo:University of Hawaii,1992),p.94.,

(2)中共第十七屆黨代表大會專欄：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10/14/content_6173274.htm

註：「六大」比「五大」的人數減少一萬七千多人，這是由民國十六年國民黨的「清黨」以及其後中共內部的叛黨與叛變所造成的結果。

⁴⁰ 魯競，「中共黨員管理工作狀況分析」，*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6 期（民國 84 年 6 月），頁 49。

⁴¹ 同上註，頁 52~53。

從黨員年齡層看，35歲以下的黨員有1691萬名，從黨員性別和學歷看，女黨員1429萬占黨員總數19.7%。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黨員2219萬名，占黨員總數30.7%⁴²。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中共的黨員結構與黨的體質也因經濟建設需要而逐漸調整。據統計，截至2006年底，全國非公有制企業的中共黨員達286.3萬人，還有81萬名中共黨員來自工商界的個體戶。從2002年至2006年，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數量由9.9萬個增至17.8萬個，成長79.8%。這表明，近年中共黨組織的體質轉變，這是具有制度變遷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的。事實上，伴隨非公有制經濟的不斷發展，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也經歷，從起步、探索到不斷拓展的過程。特別是，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寫入黨章，為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活動提供理論依據與合法化基礎⁴³。隨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和黨員人數成長，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政治地位也不斷提升⁴⁴。

事實上，中共人力資源的黨組織是政權基石人民群眾的優化配置。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名言是：我從群眾來，又從群眾去。劉少奇也說：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就是不可戰勝的⁴⁵。基本上，中共黨組織好似無所不包的「連環套」，貫串社會各階層，而各組織則藉功能互依（interdependence of function）整合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因而，產生巨大的組織意識（consciousness）、自主性與國家能力⁴⁶。

（三）控制政府與國家：中國大陸的憲法與西方國家或其他國家的規定不同。中國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是工農階級對國家領導的先鋒隊⁴⁷。因此，中國共產黨是所有政治權力的來源並合法控制其他各型組織⁴⁸。中國共產黨對政府機器這複雜系統進行指揮與控制是透過政府各機關來實行黨的政策與計畫⁴⁹。若把國家定義為一個組織系統，則政府（government）是這個組織的核心部份。但在中國除行政系統外，還有一套附在行政系統之上的

⁴² 葉曉楠，「中共黨員結構呈新特點更趨合理」，*人民日報*（海外版），<http://china.rednet.cn/c/2007/07/20/1263968.htm>，2007年7月20日。

⁴³ 同上註。

⁴⁴ 「非公企業中共黨員增至近300萬使中共獲持久發展新源泉」，*新華社*（北京），<http://news.big5.gog.com.cn/system/2007/08/23/010116224.shtml>，2007年8月23日。

⁴⁵ 楊汝舟，*中共群眾路線研究*，頁13。

⁴⁶ 同上註，頁134。

⁴⁷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p.123.

⁴⁸ Ibid., p.73

⁴⁹ Chou Erh-fu, "The CPPCC: Consulting on Affairs of State," *China Reconstructs*, vol.27, no.8 (August 1978), pp.3~4.

系統與組織此即黨務系統。它在中央有直屬機構，各省市有黨委，黨的基層組織則滲透在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團體、軍事連隊等等。黨務組織與系統其功能在維持中國共產黨統治。雖說行政管理國家，但黨抓政治，黨管政治⁵⁰。

中國共產黨掌控國家機器是透過黨務結構與個人的平行式雙重連鎖（interlock）。例如華國鋒曾是中共黨主席也是政府機關的國務院總理，又是共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⁵¹。之後，江澤民與胡錦濤也都有這「職務連鎖」現象。又如 1978 年中共國務院的十三位副總理，其中九位就是中共政治局成員，而這十三位全部都是中共的中央委員。此外，國務院有卅六位閣員分管政府的不同部門，如經濟計畫、資本建設、研究發展、對外貿易和輕重工業。因此，政府事務都落於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成員之手。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最高決策單位政治局是平行於政府閣員的功能性組織。另一方面，在每個政府機構也都存在中共領導的黨細胞（cell）。基本上，中國共產黨能控制國家機器是透過黨組織對從政黨員的個人監督與互動。這種黨組織與個人對國家與政府的連鎖性控制，是從最高層次到最基層的「一體適用」⁵²。

中國共產黨黨組織的功能在實現：人員甄補、有關黨路線的政治與意識型態教育、黨紀貫徹與實施，並與群眾維持緊密連繫。是以，黨組織是對既有的企業、社區或機關提供黨務上的領導、監督與指揮。從最高的總書記到基層黨組織的書記都實行全面性領導⁵³。長期以來，中共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其本質實為共產黨一黨專政。毛澤東於 1949 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為維持一黨獨裁制度，中共由黨內而黨外，控制所有組織、機構、人員和社會，就是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正如毛澤東所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⁵⁴。

⁵⁰ 「民間要求中共脫離國家，中共擬納黨幹入公務員」，大紀元時報，[http://www. epochtimes. com/b5/5/1/6/n772212.htm](http://www.epochtimes.com/b5/5/1/6/n772212.htm)，2005 年 1 月 6 日。

⁵¹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p.123.

⁵² Ibid., p.120.

⁵³ Thomas Jay Mathew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zechwa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42(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6~110.

⁵⁴ 吳安家，「中共統治五十年的理論與實際：黨的領導」，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9 期（民國 88 年 9 月），頁 4。

四、中共黨體質的適應性轉型

「保黨、救黨」是蘇聯巨變以來，中共領導人嚴肅思索的問題⁵⁵。在中共黨史上，不論建政前 1942 年到 1943 年的「延安整風」、1947 年到 1948 年「土改整黨」或建政後 1950 年至 1951 年的「整風整黨」、1980 年至 1982 年的「整黨」以及江澤民推動的「三講教育」與「三個代表」的黨內學習運動，或胡錦濤推動的「保持黨員先進性運動」⁵⁶都不例外，都可視為中共回應環境挑戰的反應。事實上，不論黨的改革或政策創新與調整，都將帶來黨國體質的漸變與轉型，其目的主要在適應外界的變化與挑戰。雖然，八〇代後的「整黨整風」已不若之前的嚴厲鬥爭，但著眼於強化執政與鞏固權力的政策邏輯（policy logic）卻是相同⁵⁷。例如，1987 年 10 月，中共召開「十三大」，政治改革被視為重要議題。趙紫陽的報告題為「政治結構改革」，提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中共的改革路線定調⁵⁸。事實上，趙紫陽的公開報告應視作中共全黨的共識。趙紫陽指出，政治系統的缺失是權力過度集中、官僚主義漫延以及封建主義影響。他提出的改革有：黨政分離、權力下放、機構合併、「人大」功能加強、加強司法獨立等等⁵⁹。又如，江澤民為解決國際、國內與黨內的棘手問題，遂於 1997 年 9 月「十五大」揭櫫政治改革的目標，這包括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加強法制建設、推進機構改革、完善民主監督及維護安定團結⁶⁰。就某層面而言，中共是藉由改革手段來糾正黨的結構缺失，以鞏固國家自主性從而獲取或增強國家能力來維繫政權存續。

⁵⁵ 江振昌，「大陸農村幹群關係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民國 81 年 11 月），頁 62。

⁵⁶ 2007 年，中共決定推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進行上自總書記及政治局成員，下至基層黨政機關組織的全面性黨建運動。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共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教育活動，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更好地肩負起歷史使命」。這可謂胡錦濤全面掌權後，首度大規模推行的黨內運動。其訴求主軸擺在胡錦濤時代強調的「強化執政能力建設」、「科學發展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諧社會」等口號。誠如胡錦濤「保先運動」是要保持中共黨和黨員的先進積極性。請參閱 王正旭，「中共保先運動之進展與評析」，*中華歐亞基金會*，<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909>，2007 年 7 月 13 日，

⁵⁷ 王信賢，「中共保先運動的發展與評估」，頁 14~15。

⁵⁸ 李英明，「論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頁 85。

⁵⁹ James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p.143.

⁶⁰ 傅岳邦，「新世紀中國共產黨體質轉型之展望」，頁 39。

黨務改革應可視作黨體質轉型的一環。在文革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是高度制度化的，但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之後中共從事轉型與加強制度建構。這轉型與加強的過程與本質，是穩定化（stabilization）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例如 1982 年，中共「十二大」為加強與維持內部紀律，就增設與制度化「中央委員會紀律檢查」這新機構⁶¹。從 2002 年「十六大」以來，中共的改革進入快速期。從中央到地方，在黨務公開、黨內民主建設方面已形成一些制度，如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地方各級黨委的常委會、紀委常委會分別向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作工作報告等。又如試行「中國共產黨內監督條例」或「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都有助中共黨內的制度化合理化與應變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中共提出建設開放型政黨，保證黨員群眾對組織活動有充分「知情權」，以監督領導幹部的執政行為⁶²。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認為，如果加上胡錦濤在「中紀委」第七次全委會提出的「加強幹部作風建設」以及「兩會」期間提出的「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公僕意識、節儉意識」，加總起來中共近年已有十一項的改革措施⁶³。

另一方面，改革軸線自胡錦濤接任以來，再度將「黨內民主」列為政治改革重點。十六大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示範作用」，並提出具體措施與制度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這包括：（1）擴大在市、縣進行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探索閉會期間發揮功能的方式；（2）完善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機制，進一步發揮全委會的作用；（3）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4）建立和完善黨內的狀況通報，反應和重大決策的徵求意見等等⁶⁴。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指出。過去五年，中共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的重要成果，就是黨的集體領導得到加強，胡錦濤指出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反對和防止個人或少數人專斷。事實上，中共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既是中共中央集體領導探索創新的過程也是全黨形成政治共識的過程。全國黨建研究會會長虞雲耀說，自「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黨越來越注重與加強集體領導，在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期間，相關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虞雲耀說，一

⁶¹ Parris H. Chang, "Provincial Party Leader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p. 501~539.

⁶² 「中共擴大黨務透明度建民主政治」，中國評論新聞網（香港）<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7/08/23/ZM-784776.htm>，2007 年 8 月 23 日

⁶³ 「李君如透露中共黨建戰略佈局」，中國評論新聞網（香港），<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5/1/4/10035140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351406>，2007 年 4 月 19 日

⁶⁴ 同上註。

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證集體領導的實現，這與過去相比是很大的進步⁶⁵。在歷史經驗上，中共在集體領導上曾有慘痛教訓。文革期間，權力過於集中使黨和中國遭受巨大損失。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說，黨從這段歷史吸取教訓，加強集體領導成為共識。在集體領導過程，不同意見可得到充分表達。為加強集體領導，十六大對黨章作補充，明確規定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等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後作出決定。基本上，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形式就是集體領導。集體領導的重要目的是避免「一個人說了算」，個人不能決定重大問題，這是黨領導的重要原則。虞雲耀也說，因為有集體領導，中共才獲得作出正確決策的組織保障⁶⁶。就制度觀點而言，組織保障即制度性或制度化的穩定性保障，這實質上在增進中共的執政能力與「拒變防腐」作用。

胡錦濤強調：繼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著力建設高素質領導班子⁶⁷。於是，中共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等戰略思想⁶⁸。另外，在十七大上，胡錦濤提出，要推行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幹部的「票決制」。其次，2004年，中共組織部頒發「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明確規定對重要幹部的任免實行全委會票決制⁶⁹。

五、結論

雖然，中共黨組織存在不少缺點，如鄧小平1980年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海外媒體也披露中共基層黨組織已處癱瘓⁷⁰。大陸人民對中共若干黨政官員的腐敗、道德淪喪、官僚氣息、作風顛預是心存怨懟⁷¹。其他，如黨員的管理流

⁶⁵ 魏武、章利新、孫曉勝，「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集體領導」，新華網（北京），<http://news.163.com/07/1021/07/3RAFATUM0001124J.html>，2007年10月15日。

⁶⁶ 同上註。

⁶⁷ 同上註。

⁶⁸ 同上註。

⁶⁹ 同上註。

⁷⁰ 「民間要求中共脫離國家，中共擬納黨幹入公務員」，大紀元時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5/1/6/n772212.htm>，2005年1月6日。

⁷¹ 王正旭，「中共保先運動之進展與評析」。

於形式主義，脫離實際相當繁瑣⁷²。雖然，中共存在組織惰性（inertia）或組織結構的能趨疲（entropy）⁷³，然而卻一次又一次在外界預測將遭到崩潰與覆亡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並且日愈茁壯為「中國崛起論」的大國聲譽與地位，則它應有自身的「正面力量」或「支持因素」。這可能是外界一直「測不準」的原因。就以中共的「整風」、「黨的路線調整」甚至是黨內鬥爭而言，外界經常直覺式與表面式的認為，中共政權或黨組織將引起動盪而形將覆轍或覆亡。但從中共的觀點，這也許是黨國體制轉型，以適應政治環境變遷與挑戰的作法與國家行為（state behavior）。

中共的國家行為基礎必有其「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在中國大陸，中共是透過黨組織的完整性與操作來確立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取得。中國共產黨是全民結構的優化組合與制度設計（institution device），中共再用黨組織去導引與控制人民群眾，以達到政權穩定之目的與效果。就西方國家標準，黨組織只是人民團體的志願性組合。但在中國大陸，中共卻具有憲法保障的優勢性政治地位，而幾乎掌控所有政經資源。就團體論（group theory）的觀點，中共黨組織事實上也是一個大型的政治性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因此，中共黨員是利害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可能是使中共歷經各政治危機而能屹立不搖或安然渡過的主要原因。基本上，中共的黨國運作邏輯有其內在的抉擇理性（choice rationality），外界若越能深入理解，應該越能避免上述「理論預測與事實存在的落差」，這對西方國家或台灣，不管是政府或學術界都是如此。

（投稿日期：97 年 4 月 3 日；採用日期：97 年 5 月 15 日）

⁷² 魯競，「中共黨員管理工作狀況分析」，頁 59。

⁷³ 「能趨疲」（entropy）是從熱力學第二法則借用的概念。這不僅限於物理學、或自然科學界，它的普遍性更涉及經濟、社會、歷史、人文、哲學乃至日常生活各方面。它小則影響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大則有扭轉人類文明之勢。請閱 李崇江，「大家談科學」。<http://library.hwai.edu.tw/science/content/1986/00060198/0014.htm>。行政學者卡斯特與羅森威（F. Kast & J. Rosenzweig）曾借用熱力學的「能趨疲」（entropy）（或譯熵）概念，解釋一個封閉體系會因能量遞減而趨向衰退或破敗；而一個有機或開放的體系則具有「反能趨疲」（Negative entropy）作用，不斷輸入新的能源以維持自身，以減低「能趨疲」趨勢而達新陳代謝效用。請閱 李冠德，「能趨疲的民進黨」，2008 年 4 月 8 日，<http://www.nownews.com/2008/04/08/301-2255751.htm>。總之，在此它是指，系統組織由秩序狀態趨向無秩序、混亂或衰敗的狀態。